

# 中外名人傳

(五十九)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廿四頁）

## 馬星野（一九〇九—一九九一）

中央日報社長

中央通訊社社長

駐巴拿馬大使

國民大會代表

### 文名早著筆名行世

馬星野傑出的報人、新聞學者，先後擔任中央日報社長，中國國民黨中央第四組主任、中央通訊社社長、董事長、駐巴拿馬大使及國民大會代表。

馬星野，浙江平陽人，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九月十三日生於平陽故居，初名馬偉。稍長讀杜工部詩「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句，喜其雄偉壯闊，即摘其

中兩字為筆名。旅美時，為國內各大報刊撰文，即署名「馬星野」，由於文章華美，傳誦一時，「馬星野」名聞四方，遂以筆名行世。

馬家在平陽為書香世家，其祖父馬維藩（蓮屏）為平陽名儒，畢生以教讀為職志。其父馬毓麟（敏中），十四歲入泮，為前清秀才，長於詩文，在平陽創設「求我書院」任院長。其伯父馬毓騏（筱屏），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創辦溫州中學。其叔父馬毓驥（季洪）創設「穎川書院」，一門俱是教育家。

馬星野為其父的獨子，有七姊妹（明秋、新秋、春秋、宛秋、馥秋、美秋、壬秋），四歲啟蒙，由祖父教讀「四書」「左傳」，九歲進入平陽高等小學，續隨祖父讀唐詩及經書，奠定深厚的國學基礎。

他曾自言：「我對於詩經有特別愛好，我喜歡背詩經的長詩，如谷風，如七月，如氓之蚩蚩，如六月棲棲，到晚年還沒有忘記。以後便讀陶潛、杜甫、白居易、陸放翁的詩，不到十歲，已背得很多長詩。」

一九二二年夏，他高小畢業；秋季，升讀溫州浙江省立第十中學，在校四年，得名師朱自清、杜志文指導，學識精進，於文哲史地及詞賦戲曲，均有涉獵，常任壁報「春雨報」及校刊「秋籟」主編，遂使他對新聞工作漸有偏好。

### 黃埔主編黨軍日報

一九二六年夏，馬星野考入廈門大學預科，翌年，升讀文學院。時正值革命軍北伐，廈大發生學潮，師生罷課，馬星野無書可讀，遂返回浙江。是年五月，國民

政府奠都南京，決定創辦中央黨務學校，由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兼任校長，派戴傳賢、羅家倫為正副教務主任，實際主持校務。丁惟汾為訓育主任，陳果夫為總務主任。是年夏，馬星野仍無法回廈大復學，遂赴南京報考黨務學校，與考者八百餘人，錄取一一四人，馬星野列名金榜。八月，第一期學生開學，一九二八年二月，黨校遷往南京建鄴路紅紙廊前江蘇法政專門學校舊址；春，蔣兼校長第一次向全校學生致訓詞，由馬星野振筆疾書，筆錄演詞，講後，講稿呈閱，蔣中正極為欣賞。校中講席名師如雲，有方東美、趙蘭坪、周鯁生、王世杰、羅家倫等；六月，以第一名畢業於黨校第一期，畢業後任「黨軍日報」主編，此為其投入報業之始，工作之餘又兼中央訓練部編審，他自言：「畢業後，就擔任『黨軍日報』主編，那時候的南京真是年輕人的世界，像我才十九歲，就包辦了報紙的大部分重頭工作；寫社論，作標題，還編輯。這許多工作充實了我辦報的經驗，也提高了我對新聞事業的興趣。」是年八月，國民政府決定把北京清華學校改制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九月羅家倫北上就職，任馬星野為

校長室秘書，助編「清華校刊」，在清華半工半讀，與恩師朱自清異地重逢，常在清華園的荷塘月色中，向恩師請益。一九二九年春，羅家倫因公南下，由吳之椿代理校長職務，馬星野由校長室轉到校務處工作；四月，迭接黨校段錫朋、吳挹峰、余井塘等師長來電，促南歸為母校服務；六月，中國國民黨決定把中央黨務學校更名為中央政治學校，仍由蔣中正兼任校長，任丁惟汾為教育長，余井塘為教務主任，谷正綱為訓導主任，吳挹峰為總務主任，設行政、法律、財政、社會經濟四學系（旋增設外交、教育兩學系），修業期限定為四年，蔣兼校長指示以「造成黨的新人才」為政校教育方針；是年秋，馬星野任政校教務處編譯部編譯兼「中央政治學校校刊」主編。

### 政校最年輕的教授

一九三一年春，政校選派學生到國外研究政治和經濟，馬星野參加考試，獲得錄取，原本要研究教育，適值美國密蘇里大學校長威廉博士（Dr. Walter Williams）到北京燕京大學演講，並商定密大及燕大學生交換計劃。適巧政校當局認為新聞學

也很重要，以馬星野辦過報，對研究新聞學很有興趣，遂同意他改科，學習新聞。於八月赴美，同行者有同班同學劉覺民，抵美後，進入密大新聞學院新聞系三年級，為我國派赴密大新聞的第一位學生。在密大留學，他自認最大的收穫是在工作中求知，教學中心是「密蘇里人報」，除理論科目如新聞學原理、新聞史、廣告學外，其他採訪學、編輯學、社論研究、印刷及排字、廣告發行、雜誌、專欄全在報館中邊教邊作，習得紮實的理論和經驗。此外，他又讀了美國政府、國際關係、國際法、國際組織、美國外交史、世界地理等課程，使他的學問大增，成為一位內外兼備的專業新聞學者。

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原擬進入哈佛大學深造，卻先接到哥倫比亞大學的入學許可。本擬就讀哥大，卻突接政校電令，促回國服務。乃於是年五月回國，回國後蔣兼校長召見，詢及服務志願，答稱：辦報。蔣先生笑笑說，辦報很重要，但沒有人幫忙是不行的，中國的好記者太少，應先訓練一批新聞記者幫助辦報才行。得到這個指示，馬星野遂在外交系四年級開設「新聞學」選修課程，當時他年僅廿五歲，

中教務主任程天放怕他鎮不住學生，四年級學生為畢業班，不會為難他。九月，開始上課，翌年春，「新聞學」列為外交、政治、法律、經濟四系之選科；九月，政校增設新聞系，由程天放兼任系主任，馬星野任講師，講授「新聞學」、「新聞史」課程，他上課態度嚴肅，不講廢話，一進教室就講，講到下課就走人。當時規定凡在政校讀完二年級之學生，可以轉入新聞系，第一屆學生有曹聖芬、錢震（伯起）等十一人，同年冬，課餘約集學生創辦實習刊物「中外月刊」，月刊分編輯、經理二部，編輯部由馬星野以發行人兼總編輯，經理部由朱沛人負責，封面設計仿效美國「時代」(Time)週刊，在正中刊一張新聞人物之大照片，創刊號之封面人物為阿比西尼亞國王塞拉西(Haile Selassie)。

是年十月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揮軍入侵阿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中外月刊」出版後立刻成為南京銷路最大之雜誌，與上海「東方雜誌」等並駕齊驅。又以新聞系師生作基本會員，組成「新聞學會」，是時程天放離校赴歐，任中國駐德大使，由馬星野繼任新聞系主任，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與

辜祖文在南京匯文女子中學禮堂結婚，由羅家倫任證婚人；九月，在政校講授「社論寫作」課程。

為充實學生專業技能，馬星野聘請申報採訪主任錢華及申報編輯主任俞頌華來校，授採訪學、編輯學，以期理論與實務兼習。

一九三七年四月，政校新聞系第一期學生畢業，馬星野親率赴上海申報實習。

七月，抗戰軍興，中原板蕩，九月，政校奉命遷江西牯嶺，「中外月刊」到牯嶺後因印刷困難而停刊；十二月，政校復由牯嶺經長沙遷至湘西之芷江，以芷江舊沅郡中學為校址，新聞系在芷江接辦八開一張之「芷江民報」，更創辦「新聞學季刊」。

一九三八年七月，復隨校由芷江經貴陽西遷四川重慶；九月，政校勘定以巴縣南溫泉為校址。一九三九年一月，南溫泉新校舍落成；九月，政校大學部停止招生，另設專修部，辦有新聞事業專修班。一九四三年二月再恢復新聞系。一九四一年三月，「中國新聞學會」成立於重慶，加入為會員；同年在南溫泉起草「中國新聞記者信條」十二條，作為從事新聞事業者道德、修養和行為之標準。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政校教育長張道藩調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馬星野為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處長，該處下設管理、資料兩科，任內創辦「中新資料供應社」，是為中國資料供應之濫觴。一九四三年九月，政校與中宣部配合戰時需要，合作創辦新聞學院，招考精通英文之大學畢業生，培訓國際宣傳人才，其教學方針採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之方式，集中於英文新聞之實務工作，兩年畢業。由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任院長，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處長曾虛白任副院長，教授以哥大新聞學院教授為主，課程中僅有三項中文科目，馬星野講授「新聞學」、甘乃光授「中國政府」、潘公展講「三民主義」；新聞學院出版英文「重慶新聞」(The Chungking Reporter)，由美籍教授擔任指導。

### 接長南京中央日報

一九四五年五月，馬星野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八月，抗戰勝利，遷都南京，十一月，接替胡健中任南京中央日報復刊後的首任社長，聘王新命為總編輯，陶希聖為總主筆，盧前(冀野)、方豪、錢納水為主筆，力求報紙

雜誌化，注重副刊，為讀者提供精神食糧，又極力爭取新聞自由與時效，於短期內令報紙轉虧為盈，同時兼任「中國新聞學會」、「南京報業聯合會」常務理事，並在中央大學、政治大學任教，講授「新聞學」，又兼政大新聞系主任。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任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改組成為有限公司，由陳立夫任首任董事長，陳誠（辭修）任常駐監察人，馬星野任常務董事兼社長，黎世芬任總經理。他辦南京中央日報堅持職業道德，強調新聞第一，由於報導認真，他曾被國民黨中央記過，在南京街頭被流氓追打。一九四七年秋，南京「中央日報」為培植言論撰述人才，特設立新聞研究班，招考研究員十名，作為期半年之研究講習。一九四八年初，由全國新聞界推選，馬星野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三月，隨首席代表張彭春出席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之聯合國新聞自由會議，代表中國參加訂定「世界新聞自由憲章」，會後順道考察瑞、法、英、美各國新聞事業及政治、社會狀況；五月，返抵南京，創辦「報學」半月刊，藉以提高新聞界之道德與知識水準；八月十二日，朱自

清病逝北平，年五十一歲；九月，以南京「中央日報」社社長名義，發起在「文化堂」舉行「朱自清教授追悼會」；十月二十五日，應臺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之邀前往臺北，參觀「臺灣省光復三週年博覽會」，馬星野代表「中央日報」在博覽會上主持新聞圖片展覽。由臺北返南京後，於十月三十日請陳董事長立夫召開董事會，討論籌設「中央日報太平洋版」（正式出刊時改稱臺北版）於臺灣，並派總經理黎世芬赴臺負籌備之責任。十一月，南京「中央日報」社委託中央信託局代向美國高斯公司訂購之一部高速高斯（Goss）印報機由輪船運抵上海，準備由火車運往南京，因剿共戰火南移，時局有變，毅然決定「把機器卸下火車裝船運到臺灣去」；十二月二十六日，段錫朋病逝上海，在「中央日報」發表「哭段錫朋先生」一文為悼；同年南京「中央日報」倉庫為潛伏之共黨縱火，損失不貲。

### 洞燭機先移報台北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總統引退，三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台北版創刊，發行版次銜接南京版次，日出兩大張。由於工

作同仁努力，不到半年即為台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一九五〇年三月，蔣總統復行視事；六月，運臺之高斯印報機正式投入服務；八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陶希聖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星野任副主任委員；十月，董顯光繼陳立夫任「中央日報」社董事長；同年遷「中央日報」總社於臺北，更創辦「中央日報香港航空版」及「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並在臺北組織「臺北市報業公會」、「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及參加行政院之收復大陸後之設計工作，公餘在臺灣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身）、青年服務團講授「新聞學」。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陳果夫病逝臺北，親視彌留；同年任曹聖芬為副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五二年八月，卸除「中央日報」社社長職務，由蕭自誠繼任社長，轉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任。一九五四年八月，中國國民黨七屆四中全會被任為宣傳組長。五中全會後續任第四組主任。一九五七年八月，任出席聯合國第十二屆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十月，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仍兼第四組主任。一九五九年五月，沈錡繼馬星野為第四組主任。

七月十一日奉派繼段茂瀾為駐巴拿馬大使，上任後，予人印象一新。一九六〇年二月，巴拿馬外交部長莫萊諾 (Miguel Morero) 應邀訪華，代表巴拿馬總統授予蔣總統大十字勳章，馬星野陪同莫萊諾飛臺，蔣總統特派黃少谷為商訂中國與巴拿馬文化專約全權代表，同月兩個文化專約在臺北簽字；七月，馬星野與羅家倫代表「國際筆會中國分會」前往巴西里約熱內盧、聖保羅兩地出席「國際筆會」(International P. E. N.) 第二十一屆大會。

### 任中央通訊社社長

一九六三年二月，馬星野當選中國國民黨第九屆中央評議委員，一九六四年十月，財政部長徐柏園訪巴拿馬，簽訂「中巴貿易協定」，十月，政府免除馬星野的大使職務，由黃仁霖繼任，馬星野回國出任中央通訊社社長，於駐巴大使任內，馬星野獲巴國政府頒贈一等 *Officer* 大綬勳章，政府亦授予一等景星大綬勳章。馬星野於歸國途中，道經紐約，邀林語堂寫「無所不談」專欄，撰文近兩百篇，為其出版專集兩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就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任內改進電訊傳遞及廣

播設備、改革內部組織、擴大新聞報導範圍、加強與國內外同業合作、參加「亞洲新聞通訊社組織」、改變體制加強企業化經營。一九六五年四月，與「美聯社」亞洲區總裁恩森簽約合作；一九六六年十月，民間學術研究機構中華學術院成立（創辦人兼院長張其昀），後獲委為哲士。七月，代表「中央社」出席在日本東京舉行之「亞新組織」第二屆大會，在會上提議設立秘書處，出版「公報」(Bulletin) 與「新聞信」(News Letter)，均獲大會通過，大會推選日本「共同社」社長福島慎太郎代表為主席，我中央社社長馬星野當選為執行理事會理事；八月，與「路透社」簽約合作。一九六九年三月，前往印尼

雅加達出席「亞新組織」執行理事會會議，會中提議成立「亞洲新聞中心」，集中收錄所有會員社之英文新聞廣播，經彙編新聞傳播後，即予廣播供各會員社收錄運用，藉以增進亞洲各國之新聞交流，獲執行理事會通過採納；四月，任中國國民黨十屆中央評議委員；九月，與林語堂代表「國際筆會中國分會」出席在法國蒙敦城舉行之「國際筆會」第三十六屆大會。一九七〇年八月，偕總編輯沈宗琳出席在東

京舉行之「亞新組織」第三屆大會，「中央社」社長馬星野獲選連任執行理事會理事。

一九七二年六月，中央社改組，馬星野任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魏景蒙繼任社長，同時任「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翌年二月，韓國漢陽大學授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四月，中央社再改組為公司組織，當選第一屆董事長。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蔣中正總統病逝，秋天，陪林語堂赴慈湖謁靈，馬星野賦五絕一首：

「石柳天人隔，慈湖遺愛深。  
淒涼兩行淚，感激十年心。」

### 獲密大傑出新聞獎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續任中國國民黨第十一屆中央評議委員。暇時撰稿，介紹段錫朋、林語堂及陳果夫的生平與風範。一九八〇年三月，中華民國傳播教育協會成立，當選為首任理事長。一九八一年四月，續獲任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一九八三年十月，赴美考察大眾傳播事業，撰「大眾傳播事業之新趨勢與中央通訊社之前途」一文。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於服務新聞界滿五十年後返回母

校密蘇里大學，校長莫索爾·埃列授予「傑出新聞事業終生服務最高榮譽獎」，獎品為獎狀一紙獎章一枚。一九八五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創設五十週年，校長歐陽助贈予「春風化雨」銀盤一面。同年自中央社退休。七月，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七日突罹患腦中風，送醫治療，延至次年三月瞠逝，享年八十三歲。遺著有「新聞學概論」、「新聞事業史」等書。

馬星野夫人辜祖文，為湖南革命元勳辜天保將軍之女，婚後育兩子兩女，長女馬少文，早殤，長子馬上庚，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物理學博士，任教聖地牙哥大學十七年，著有「物象變化新理論」，為國際學術界所推重，不幸於一九八三年英年早逝。次子馬少野與長兄馬上庚同校為工科博士，任舊金山貝泰公司高級工程師。並有孫輩四人，均已長大成人，學有專長，服務社會。（王善初撰）

黎薩爾（一八六一—一九〇六）

菲律賓國父

菲律賓青年黨首創人

作家、詩人、哲學家

思想才子英年被殺

黎薩爾 (Jose Rizal)，菲律賓國父、作家、詩人、哲學家、菲律賓青年黨的首創人，領導非人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一八九六年被捕，旋即被殺，年僅卅六歲。

黎薩爾於一八六一年生於菲律賓內湖省的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是中國移民的後裔。幼年即顯露出非凡的才智，讀書名列前茅，十六歲時以最優異的成績自中學畢業，隨即進入馬尼拉聖托馬斯大學。在他進大學的前夕，他的母親對他的父親說：「別再送他去馬尼拉了，他已有足夠的知識，如果再進修，可能會招致殺身之禍。」真是「知子莫若母」，他母親的憂慮是有充分的根據的。因為黎薩爾是個有氣質的思想家，隨著知識的成長，必然會對西班牙殖民暴政及菲律賓社會的悲慘狀況有所關懷和行動，也必會遭到西班牙帝國主義者的忌恨和迫害。他母親的預言不幸而言中。

少年寫詩滿篇激情

十八歲那年，黎薩爾寫了一首詩「獻

給菲律賓青年」，詩內充滿愛國的激情。這首詩後來成為菲國歷史上的名詩。又過了一年，他又編了一部諷刺性的劇本。嘲笑西班牙修道士的偽善，揭露殖民官吏的貪虐。為此，他受到殖民當局的壓力，不得不離開菲律賓潛赴歐洲留學。剛到歐洲他就寫了「熱愛祖國」一文，以生動的歷史事實歌頌自己的民族，以詩一般的語言抒發自己滿腔的愛國之情。

文中說：「愛情是崇高至上的和最有力量的。但所有的愛卻以對祖國的愛最偉大、最英勇無畏、無私。」他激勵菲律賓人，無論在怎樣的情況下，都必須愛自己的祖國，關心祖國的興亡。文章寄回國內，在馬尼拉的報紙上發表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筆鋒犀利反抗殖民

在歐洲時，黎薩爾懷著復興國家民族的壯志而發憤讀書，苦讀數年，獲得廣博的知識，成了國際知名的學者。他深入鑽研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反對宗教迷信和封建專制統治的學說，掌握了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思想武器，投入了喚醒菲律賓民族的宣傳運動。



他同菲律賓的幾位愛國知識分子，在西班牙的馬德里組織了愛國團體，並創辦了《團結報》，為推動菲律賓的社會改革而大聲疾呼。黎薩爾撰寫了大量文章，揭露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犯下的種種暴行和天主教神甫造下的種種罪孽，提出爭取菲律賓人和西班牙人在法律上平等的要求。他的文章筆鋒犀利、切中時弊，充滿民族自豪。

西班牙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們，為了抵制和破壞黎薩爾正義宣傳，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造謠、中傷，甚至不惜採用卑鄙的手段進行人身攻擊。黎薩爾和他的戰友盧納挺身而出，在大庭廣眾之下，憤怒地向西班牙殖民主義辯護士的臉上唾去，並且提議決鬥。那些卑賤膽怯的傢伙，只好認輸道歉，宣布撤銷自己寫的東西。正像一位歷史學家所說的那樣，「黎薩爾和盧納向西班牙和世界證明，雖然他們的皮膚是棕色的，卻比損傷他們的白色人更勇敢、更體面。」

為了駁斥西班牙殖民者對菲律賓民族的誣衊、對菲律賓歷史的詆毀，黎薩爾全文抄錄了十六世紀末曾任菲律賓副總督的穆爾加的著作《菲律賓群島史記》。他對

於這部西班牙人初來菲律賓時對於島上人民文化發展水平記述尚算公正的著作，做了詳細的考證注釋，在巴黎予以出版。不僅回擊了西班牙殖民者散布的菲律賓民族「愚昧、落後」的無恥謬言，同時也為菲律賓人民認識自己的歷史、提高民族自尊心，提供了很好的教材。

### 揭露偽善民族覺醒

黎薩爾寫作快而且多，在他浩如煙海的著作中，影響最大的是兩部長篇政治小說「別碰我」及「起義者」。西班牙殖民者最怕菲律賓人觸及西班牙統治下的暴虐狀況，害怕因此激起人民反抗。黎薩爾卻偏偏在「別碰我」這部諷刺小說裡，描述西班牙殖民者「不准碰」的東西。他要向全世界揭穿「幾世紀以來對我們的毀謗、中傷」，揭露「那些穿著宗教外衣的偽君子是怎樣的使我們陷於貧困，怎樣對我們橫施暴力」，以及「他們是怎樣以迷信的手段假借神聖的名義向人民斂取金錢」。他說，他要揭穿「殖民政府的欺詐和迷惑手段」。

果然，在黎薩爾的麾下，專橫跋扈的總督、荒淫奢侈的神甫、貪贓枉法的法官

、欺凌百姓的軍官的醜惡嘴臉，都暴露無遺。在《起義者》這部小說裡，他傾訴了菲律賓民族在壓迫下的痛苦呻吟，寫出了菲律賓人民對自由的嚮往和追求，反映出菲律賓愛國志士為割除殖民地社會毒瘤所作的探索。小說中傾注的作者對積弱不振的祖國的痛楚之情，深深地激動著人民的心弦，人人為之感奮。

這兩部小說，就像兩把鋒利的匕首刺向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心窩。殖民當局慌作一團，派出憲兵日夜不停地搜查、燒毀這兩部書，不但宣布黎薩爾犯了大罪、剝奪了他父親租借的土地、焚燒了他家的房屋，使他的全家流落街頭，而且還嚴懲敢於收藏和閱讀這兩本書的人。然而，人民並不害怕大禍會隨時臨頭。居住在邊遠山區的農民，竟然跑到幾十里路外的地方，聽別人朗讀這兩部小說的片斷。這兩部小說，殖民當局越是查禁傳播得越廣泛，因而極大地推動了菲律賓民族意識的覺醒。黎薩爾在人民的心目中，成了菲律賓民族的象徵。

### 冒險回國被捕喪生

由於西班牙在菲律賓的暴政日益嚴苛

黎薩爾決定不顧個人安危，回到菲律賓去，親自為改造菲律賓而努力。在回答親朋好友的勸阻時，他說：「一個醫生哪能在老遠的地方對他的病人處方下藥呢？」他在致菲律賓人民的公開信中這樣寫道：

「很多同胞為我受到不公平的處分，我不能置若罔聞……我寧願以愉快的心情為解脫同胞們的痛苦而從容就義。」一八九二

年六月廿六日，黎薩爾回到菲律賓。七月三日，他在馬尼拉創立了以合法爭取社會改革的「菲律賓同盟」。但是，沒過幾天，殖民當局就將他逮捕、流放到棉蘭姥島的達比丹。

一八九六年八月廿三日，菲律賓人民掀起了獨立戰爭，年底，烽火燃遍了菲律賓大地。

雖然獨立戰爭的發動與黎薩爾沒有直接關係，但是，衝鋒陷陣的群眾，誰沒有受過黎薩爾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教育呢？西班牙殖民者為了恐嚇菲律賓的革命群眾，殺害了黎薩爾。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卅日清晨七點鐘。文質彬彬的年輕學者黎薩爾，絲毫不理睬背後烏黑的槍口，神態從容地站在馬尼拉的海灘上。隨著槍聲響起，在即將倒在地

上的一剎那，他以堅強的毅力轉過身來，又朝天空望了一眼正在升起的紅日，燦爛的光輝，顯示這位愛國志士的心願：汲取他的鮮紅的血液，為災難深重的菲律賓民族，送來更加絢麗的黎明的曙光！因為，他在臨刑前留下了這樣的遺言：

朝霞絢爛正漫天，我瀝碧血更盡染；  
莫道黑夜難為明，且看皎日當空懸。

### 被尊為菲律賓國父

菲律賓人民永遠懷念黎薩爾，於菲律賓建國後，由國會通過尊崇他為國父，在馬尼拉黎薩爾公園的廣場上，矗立著他巨大的大理石紀念雕像，四名武裝士兵日夜守衛在四周，象徵著他的神聖不可侵犯。  
(劉先軍撰)

### 王亞權（一九〇九—一九九四）

北京女師大講師

南京臨大教授

北平第二女中校長

台北第二女中校長

教育部中教司長

教育部次長

### 出身世宦書香門第

王亞權，女教育家，曾任北京女師大講師、南京臨大教授、北平第二女中校長、台北第二女中校長（中山女中前身）、教育部中教司長、教育部次長、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總幹事等要職。

王亞權字肖篆，安徽英山人，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三月一日生，其家為英山縣望族，她的祖父王樂陶，在清代居官多年，曾任德州鹽運使。父親王勁聞，庚子及辛丑年併科舉人，精書法、擅文章、精研法學，曾為北平著名的大律師。民國肇建後曾任最高法院法官，退休後執業律師。其母陸卉蓮夫人，出身廣西名宦之後，外祖父為清代進士，也是清朝高官。由於出身書香及宦門，王亞權自幼受父親薰陶及庭訓，奠定深厚的國學根基。一九二三年夏進入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該校為國內極富時譽的女子中學，王亞權在校勤奮學習，留心現代思潮，漸成現代女性。畢業後，考入北平女子師範大學英語系，當時我國女子受教育尚未十分普遍，北平女師大是國內女子教育最高學府，王亞權突破性別限制，考進該校時



中髦的英語系，成了學貫中西的新女性，後來成為婦女領袖，勢所必然。

一九二九年夏，王亞權以優異的成就自北平女師大畢業，未立即執教，而於是年九月赴美留學，進入華盛頓大學教育系深造，鑽研現代教育理論，於一九三二年夏獲碩士學位，旋即返國服務，出任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教育系講師。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隨校撤往重慶，先後擔任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纂，國立南京臨時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後回到南京，任陸軍大學編譯官，結識邵光明將軍，遂成愛侶。一九三六年轉任北平第二女中校長，任內在北平與邵光明將軍結婚，婚後不久，華北剿共局勢惡化，二女中校園內共黨分子活躍，王亞權難以執行校務，遂辭職南下，是年五月，由廣州輾轉來台。

### 長北二女辦學績優

一九五〇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在台復職，局勢漸趨穩定，是年九月，王亞權由教育部任命為台北第二女子中學（後改為中山女子高中）校長，在任七年，辦學認真，一絲不苟，延聘教職員均為教育界菁英，教學績優，校譽日隆，成為唯一可與

北一女中一較高下的女子中學，她的學生後來有不少人成為台灣婦女領袖，廣布海內外各界。

一九五二年，王亞權以高中校長身份被選入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為重點培植的婦女幹部。一九五四年再入革命實踐研究院聯戰班受訓，已成儲備領袖人才。一九五五年六月，張其昀擔任教育部長，邀王亞權為中等教育司司長，當時，中等教育為台灣教育重點，王亞權策劃改革學制，統一教材教法，考選優良教師，卒奠定中等教育的良好基礎，提升人口素質，以後台灣經濟起飛，她的功不可沒。

### 策劃九年國民教育

一九六七年六月，蔣中正總統提倡九年義務教育，計畫把義務教育由六年延為九年。八月，蔣總統依照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四條之規定，經國家安全會議議決，頒布命令，把國民教育年限延長為九年，王亞權職責所在，受命後，即積極展開「延長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的規劃與草擬工作，短短數月，草擬完成，第一屆國民中學學生如期於一年後入學，開創我國學制史之新頁。三十餘年來，為我國

培植不少基層幹部，造成台灣現今社會經濟繁榮發達。九年國教由擊劃至實施，王亞權所費盡心力貢獻卓越，一九六八年四月，政府特頒四等景星勳章，以肯定其努力與貢獻。除教育工作外，王亞權還協助省府執行環境保護，推行污染防治，以教育手段，促使民眾愛護大自然。省府推動「客廳即工廠」及富麗農村運動，王亞權均以婦女領袖身分出力不少。

### 出任婦聯會總幹事

一九六九年七月，王亞權由後任的教育部長鍾皎光擢升為常務次長，成為我國當時最高的女性高級行政官員，任內兼任國際女童軍中華民國總會會長，多次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活動，或率領國內女童軍出席國際露營活動，推動國民外交。王亞權在教育界任職十多年，先後輔佐張其昀、梅貽琦、黃季陸、閻振興、鍾皎光、羅雲平六位部長，均留下相當不錯的口碑。

一九七二年，王亞權屆齡退休，由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聘為家政研究所所長，行政院亦聘她為顧問。一九七四年，又奉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主任委員蔣宋美齡之命，出任該會總幹事，在職長達十七年

任內努力促進各界婦女之團結，凝聚婦女力量，成立國內外婦聯會分會，辦理學術研討會、壯大華興中學嘉惠遺屬、謀求在職軍人及軍眷福利、照顧軍人遺屬。如：建造軍人宿舍、縫製征衣、慰問陣亡將士遺屬、舉辦勞軍活動、設立模範性幼兒教育機構——惠幼幼稚園，實施理想幼兒教育、舉辦技職教育，如護理訓練、電腦訓練等，對於安定軍心，提高士氣，發揮婦女潛力及發展重點教育的貢獻頗大。並極力推展社會教育，宣揚婦運，接待來訪之各國團體及駐華之各國外交使節，同時屢次代表國家出席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聯合國文教組織大會、世界教師組織大會、世界女童軍大會等國際會議，提升國家國際地位，功在社稷。

### 移居美國感冒辭世

王亞權於一九七五年受洗為基督徒，作為心靈寄託。一九九〇年因年事已高，不堪勞瘁，懇辭婦聯總幹事職務，由辜振甫夫人辜嚴倬雲繼任。此時，她的獨生女邵玉倩服務舊金山中華航空公司辦事處，奉迎母親至美，以便親侍左右。至美後，有外孫劉世瑜、劉世璇承歡，其樂融融，

不料於一九九四年元月患重感冒，竟於元月十九日辭世，享年八十六歲，四月獲總統李登輝明令褒獎。遺體與邵光明將軍合葬於舊金山百齡墓園。

王亞權在中國國民黨內曾任中央委員及中央評議委員，多年來一直潛心研究教育學術。身後遺有譯著：「中等教育之世界趨勢」乙書，二十餘萬言。編著：「中華民國中等教育」、「中華民族中等教育長期發展計畫之研究」二書。（王培堯撰）

### 蘇曼殊（一八八四—一九一八）

革命僧人  
詩人  
小說家  
散文家

### 生於日本身世如謎

蘇曼殊革命僧人、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兼擅畫作。身在方外，卻是浪漫情懷，學通東西，為清末民初的一代奇人。

蘇曼殊，名蘇戡，字子穀，後改名為蘇元瑛，小名三郎，廣東中山人（舊香山

縣），老家在恭常都瀝溪鄉白瀝港村。一八八四年九月廿八日（清光緒十年八月初十日）生於日本橫濱，卒於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年僅卅五歲。

蘇曼殊短暫的一生，卻留下多采多姿的事跡，他的身世如謎，曲折離奇，詩文書畫直抒胸臆，禪心情孽矛盾糾結，革命心懷激越澎湃，被喻為藝文、宗教界的「鬼才」。

蘇曼殊身後，他的朋友柳亞子、馮自由對他生平極感興趣，廣搜資料並加考證，柳亞子撰有蘇曼殊年譜，馮自由撰有「曼殊之真面目」，對曼殊身世有不同的認知。後來柳亞子之子柳無忌更繼其父深入研究蘇曼殊，撰有「雜話蘇曼殊的身世與家族」、「我不認識的蘇曼殊」，並重訂其父「蘇曼殊年譜」遺稿。另有廣東高要縣人羅孝明（羅母亦日人），身世與蘇曼殊相近，基於特殊感情，在嶺南大學組「曼殊派」，專研蘇曼殊，以十年之力，蒐集蘇曼殊遺畫七十幅，遺墨一〇九件、遺物六件、遺照十九幅，與柳無忌書信往返，討論「曼殊學」，撰有「曼殊大師傳補遺」，可惜書未成而逝，由其友鄭宗樑代編完成，一九七六年在台北刊行。

根據以上諸人著述，可知蘇曼殊出身貿易世家，其祖父蘇瑞文原本經營進出口業，退休後居瀝溪原籍，由其子蘇傑生繼之，蘇傑生原名蘇勝，一名蘇仁章，又名朝英，生曼殊時為日本橫濱萬隆茶行買辦，居橫濱，擁有一妻三妾，正妻黃氏，住瀝溪原籍，大妾河合仙，日本人，與其父居橫濱，扶養蘇曼殊成長，視如己出，故而蘇曼殊一直視河合仙為生母。另兩妾均陳氏，中山人，蘇曼殊生時，僅大陳氏隨居橫濱，小陳氏尚未來歸。蘇曼殊生母，據考證為蘇傑生經商橫濱時家中的女傭，名若子，姓不詳，亦有謂為河合氏之妹或晚輩，年十九歲，蘇傑生見若子胸前有紅痣，依相法當生貴子，遂與苟合，懷孕而生曼殊，產後三月偽稱辭工他去，不知下落。蘇曼殊交由河合氏撫養，終曼殊一生，不知別有生母。

### 六歲返里飽受冷遇

蘇家是個大家庭，蘇曼殊有同父異母兄兩人、妹五人，其叔父蘇德生有四子，再加上姑母、祖父母、親族關係複雜。蘇曼殊三歲時，嫡母黃氏來日本，與河合氏、大陳氏同住橫濱。一八八九年，六歲時

，奉父命隨嫡母黃氏返瀝溪，初回中國的蘇曼殊面臨大家庭複雜的人際關係，親友間的冷嘲熱諷；雖有祖父母的疼愛，卻無法填補幼小心靈中失去「生母」的悲傷，也沒有辦法解開對自己身世之謎的許多猜測，因而造成了他日後無時無刻不感慨自己「思惟身世有難言之痛」的歧零心態，或厭世出家，或醉心情愛，或縱情酒食，或寄情詩畫，都可以從他深潛的心理中尋演出脈絡。蘇曼殊雖有滿腔熱情，曠世奇才，但這種歧零心態卻注定了他一生悲慘的命運。

一八九二年，蘇傑生在橫濱經營的萬隆茶行營運失敗，十二月八日，蘇傑生偕兩陳氏妾返瀝溪原籍，河合仙獨留日本，已與蘇傑生解緣，這一結果，使九歲的蘇曼殊飽受打擊。對父親及蘇家產生強烈的反感。此後，嫡母黃氏和大庶母大陳氏對他都十分冷漠，父子親情亦淡，蘇曼殊或隨祖父母居瀝溪，或隨姑母住上海，或依表兄住日本，對他而言，都是「寄人籬下」，身如飄萍。

然而蘇曼殊雖身世坎坷，但受教育的過程相當平順完整，可旁證蘇家對他並非完全疏於照顧，因而蘇曼殊雖有歧零心態

，卻無文人自憐自哀的毛病。他六歲由日本歸原籍，七歲入私塾，十三歲隨姑丈陳猷墀一家至上海，從師學中、英文，其間，逢祖父過世，亦未臨喪。十五歲隨表兄林紫垣至日本，入大同學校，前後五年，在校時與馮自由、鄭貫一、張文涓等交善；十九歲至東京投考高等師範學校，未入選，改考入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次年考入成城軍事學校，學陸軍，與劉三（劉季平）等過從甚密。一九〇三年九月，帝俄侵我東三省，蘇曼殊基於義憤，加入拒俄義務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倡言革命，為表兄迫令輟學回國，半途逃逸，至上海登岸，先於舟中偽寫投海自殺的遺書，郵寄林紫垣。紫垣得書頗驚駭，繼知無恙，亦莫可如何。蘇曼殊抵滬後，先至蘇州吳中公學社任教習，識包天笑、祝心淵等。旋返上海，任國民日日報翻譯，與陳獨秀、章士釗、何梅士同事。譯法人蠶俄『慘社會』（一名『悲慘世界』），撰『女傑郭耳縵』、『嗚呼廣東人』兩文，皆在國民日日報發表。時秦毓鎣已返國居滬，亦時相往來。十一月初國民日日報以內訂停版，與陳獨秀、章士釗、何梅士賃屋同居。數日後，欲離滬他去，苦無資斧，乃乘陳獨

秀、章士釗外出時，邀何梅士至戲院觀劇，脫身返寓，取章士釗銀三十圓，留書而遞。赴香港，住中國日報社，得交陳少白、王秋涓等。旋至惠州某破廟，削髮為僧。自此，蘇曼殊已完全與蘇家脫離關係，過著行雲流水的出家人生活，但心靈深處仍存有尋母（河合氏）的念頭。

### 削髮出家傾心革命

蘇曼殊為世人所熟知的「曼殊大師」，他的確是個出過家的沙彌，但他卻未在大叢林中渡過嚴謹的出家人生活。他因身世飄零而動了出家的念頭，時為一九〇四年二月中旬（農曆正月初），出家的地點是在惠州一個小廟中，只有一個主持老和尚，廟無恒產，貧無隔宿之糧，日持化緣為活。蘇曼殊剃度後，就代師父每日下山募化錢米，但每不足以果腹，曼殊深以為苦，乃趁師父外出時偷了已故師兄的度牒，離廟而去，由廣州乘渡輪抵香港，他在惠州的時間可能不超過三個月。這份度牒上的名字是南雄州始興縣趙氏子，法名博經，字遣凡，在新會縣慧龍寺出家，贊初長老為其剃度，並在廣州府雷峰海雲寺受沙彌戒及比丘具足戒。曼殊此後即以新會

慧龍寺贊初長老的弟子博經自命，署別號曼殊，曼殊之名大概由此而始。以這段經過而言，他在惠州小廟的短暫歲月中不能真正受過具足大戒，也沒有正式比丘的證明——度牒，他只是沿用了別人的身分。但終其後半生（曼殊於二十歲出家，三十五歲去世），曼殊自己一直以具足大戒的比丘心情自居，或許是用了這張度牒後的心理影響。

在香港，蘇曼殊住中國日報社，當時保皇勢力猖獗，他卻傾心革命，謀以手槍刺殺保皇黨首腦康有為，為革命先烈陳少白所阻。是年三月十三日，遇鄉人簡世錕，知父親蘇傑生病劇，簡世錕返瀝溪，其家人托其回港把蘇曼殊找回家，被他拒絕。兩日後，其父卒，他亦未奔喪。

三月底，蘇曼殊由港返滬，以後，足跡遍於長沙、上海、杭州、南京、蕪湖等地，或任教職，或駐報社，但為時均不長久，其間並遠赴印度、南洋、日本等地。當時他最大的心願即是尋找「生母」河合氏，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一九〇七年初，透過友人協助，在橫濱母子相會。雖然河合氏已改嫁一日本商人，但蘇曼殊對她的孺慕之情絲毫未減，她亦仍視曼殊為

親生，從未告知曼殊真正的身世。對曼殊而言，此一時期是他心境上較為歡愉的時刻，經常過往橫濱，與河合氏聚首，享受母愛的溫馨，從其以後的詩文中，不難體會出他已償宿願的感激之情，與得見慈顏的孺慕之心。

### 革新佛學闡釋精微

雖未受足戒，但蘇曼殊仍是位大和尚，他精通梵文，博覽群經，對佛學有獨特的看法，一九〇八年，他與章炳麟聯合發表「敬告十方佛弟子啟」一文，對當時佛教界的奢靡腐敗、趨炎附勢痛下針砭，其謂：

「仁者宏教，當視勢利如火坑矣。：今者對治之方，宜斷三事，一者禮懺、二者付法、三者趨炎。第一斷者，無販法者；第二斷者，無諍訟者；第三斷者，無狠鄙者。」可以看出曼殊極端反對佛門弟子以誦經禮懺為世人作法，甚且淪為趨炎附勢的工具。他實在是一個研究佛學的出世僧人，而不是一個以誦經禮懺入世的俗僧。

又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瑪德利馬湘處士書中，對佛教在中國發皇的歷史

佛門弟子應有的認識等亦有深入的闡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為法施生，以法教法，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祖滅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嚮盛；唐宋以後，漸入澆離，取為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度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苛責非細。」

確屬對佛門當頭棒喝。

至於蘇曼殊對物欲情慾的看法，在「做告十方佛弟子文」中謂：

「佛制小乘食三淨肉，大乘則一切禁絕，至夫室家親呢？大小俱遮，若犯此者，即與俗人無異。出家菩薩，臨機權化，他戒許開戒，獨於色欲有禁。日餐血肉而說慈悲，不斷淫根而言清淨，螺音狗行，無過此矣。」

蘇曼殊一生情孽牽連，縱情酒食、貪

、嗔三戒俱犯，因而有人懷疑他不能算是和尚。其實他因恨而入法門，一心藉此寄託，也抱著三戒俱足的觀念來警惕自己。但行為不免有所出入，但他對佛教真理的闡釋是少有人能及的。因而楊鴻烈把他比作「佛教中的馬丁路德」，雖是過譽，但卻是對蘇曼殊宗教情操的同情與讚許。

青少年時期，蘇曼殊為熱情的知識分子，渴望獻身革命，除因帝俄侵我東北，在日本參與拒俄義勇隊及軍國民教育會外，繼謀刺康有為未果，乃轉而以筆桿為槍枝，宣揚抗清節義，如其所撰（嶺海幽光錄）中對滿清入關時英勇抵抗的官吏，堅貞不屈的節婦有極高的頌揚；或介紹外國的革命史實，如「婆羅海濱遁蹟記」的藉印度人亡國後之哀號慘呼，以喚醒醉生夢死之國人；或嘲罵廣東同胞對西人搖尾乞憐的可悲；或讚美美國無政府主義者郭耳曼的信仰。在日本時，他曾和章太炎、劉申叔同辦民報及天義報，民報是同盟會提倡民族革命的機關報，天義報卻是鼓吹無政府主義的。辛亥革命成功時，他欣喜若狂；但當革命後政治情勢發展受挫折時，他的熱情也跟著幻滅，取而代之的是對政治的冷漠，和只談風月的冶遊。當袁世

凱帝制野心暴露時，蘇曼殊又深感作為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曾在東京發表「討袁宣言」，中有「普國以內，同起討伐之師，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之言，此時又激起了愛國意識。一九一三年冬末，孫中山於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他於翌年二月謁之於東京赤坂區靈甫寓次，極承優遇，又深受感動而矢誠加盟，與中華革命黨人居正、邵正沖、田桐、戴傳賢、楊庶堪等時相往還，經常在民國雜誌上發表小說和隨筆；也經常為章行嚴的「甲寅」雜誌、陳獨秀的「新青年」撰文。一九一六年蘇曼殊返國，時居正為中華革命軍總司令討袁，他往訪長談，對袁世凱的竊國至為憤慨；但到了一九一七年夏天之後，以胃疾日深，體力日衰，對人生之感觸益趨消極，遂不復壯志熱情，「逐聲色於酒綠燈紅之際，窮嗜好於糖果雪茄之中」，而至生命盡頭。

### 詩畫卓絕空靈高蹈

蘇曼殊畢生最大的成就還在詩文，他的浪漫情懷和悲觀天性，在詩文中表露無遺，在詩文中他坦承經不住肉慾的誘惑和愛國心的驅策，但他的畫卻空靈高蹈，具

有超塵脫俗之美。而他的論文與短篇小說，則是非常關心社會問題的理想家那種激烈複雜的情緒。他的見解、情操在所有作品中都保持一致。換言之，他身上兼有種種理想的、浪漫的與反叛的特質，疾病、孤獨使他處於低潮時，理想主義而萎縮成極端的悲觀主義，變成一種對人類價值的藐視。

蘇曼殊在詩上的功夫，顯露出充沛的才氣和深不可測的創造力。陳仲甫談他學詩的過程：「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就沒好好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的程度實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不曾好好的教，只由著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不管是古人的、是現代的，天天拿來讀，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後，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柳亞子對他的形容更貼切，在「蘇曼殊之我觀」一文中謂：「他的作詩，全不用心去作，全靠天才，他的詩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他的詩雖然不用心去作，可是自然而然的非常優美，給讀者一種

雋永清新的味道。」

蘇曼殊的散文數量遠超其詩，功力亦高，他的文章可分三類：第一類為議論性的雜文或序言：表達了其個人的思想與理念，但由於他多變的性格，使他的文章亦顯得零亂而無系統。第二類是書札：充分流露出他的真性情，絕俗的格調、優美的描辭、細膩的筆觸、深雋的情感，完全表現出其人其才。柳亞子「燕子翕遺詩序」中描述曼殊的書札：「好似粉紅牋作蟲頭細楷，造語亦絕後，恆多悲感及過情之談，蓋蘇長公一肚皮不合時宜，藉此發洩耳。」確數的論。至於第三類則是最膾炙人口的小說，曼殊的小說，不論在風格、情感表達，都細膩委婉、高人一等。另外，蘇曼殊還是一位譯作家，英籍漢學家將曼殊列名為中國三大翻譯專家之一，他率先翻譯拜崙和雪萊的詩，封他們為愛情與自由化身的大詩家。他譯的「拜崙詩選」在一九〇九年始終是獨占鰲頭的中譯本。加上他另外三部譯作：一九〇八年「文學因緣」、一九一一年「潮音」和一九一四年「漢英三昧集」，使他成為英詩翻譯的前驅和卓越的編選者。他在翻譯工作上的成就，擴展了中國對西方文學的知識領域。

### 韻事著作筆名三多

曼殊的韻事多，著作多，連名字也多，據統計他用過的筆名多達四十三個。他一生中幾乎無時不在創作，據他自己說過的作品有：「梵文典」八卷、「梵書磨多體文」、「沙昆多邏」、「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以及「旅程圖」、「泰西群芳名義集」、「泰西群芳譜」、「埃及古教考」、「粵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鬼記」、「英譯燕子箋」，惟今天均已不見下落，除「梵文典」八卷以外，究竟成書與否亦不可考。蘇曼殊逝世後，經柳無忌整理收入曼殊全集中的，是詩集一卷、譯詩集一卷、文集一卷、書札集一卷、雜著集兩卷（包括「嶺海幽光錄」、「燕子弓隨筆」）、譯小說集二卷（包括「悲慘世界」、「娑邏海濱遺蹟記」）、小說集六卷（包括「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共十四種。其中曾經單行的，除詩集外，只有「悲慘世界」、「斷鴻零雁記」和「絳紗記」、「焚劍記」的合刻本；此外還有「文學因緣」、「潮音集」、「拜



中外 雜 誌  
「審詩選」、「漢英三昧集」四種，都有單行本行世。

### 著作宏豐胃疾辭世

蘇曼殊的作品經他人搜集成書的，除合集外，尚有柳無忌的「蘇曼殊詩集」、「曼殊譯者兩種」（包括「嶺海幽光錄」、「婆羅海濱遁蹟記」）、何震的「曼殊畫譜」、蔡哲夫輯「曼殊上人妙墨策子」、柳亞子輯「曼殊遺蹟」、王德鐘輯「曼殊上人燕子厂遺詩」、馮雪秋輯「燕子厂詩」、沈尹默輯「曼殊上人詩稿」、周瘦鵬輯「燕子厂殘稿」及「曼殊遺集」、段菴編輯「燕子厂僧集」、盧冀野輯「曼殊小說集」、光華書局輯「曼殊詩集」、「曼殊小說集」、金織雲女士輯「曼殊代表作」、時希聖輯「曼殊小叢書」，共十餘種之多。

### 中外名人傳 (九十五)

一九一七年夏天，蘇曼殊胃病轉劇，經革命同志蔣中正、陳果夫接往新民里同住養病；冬天，轉入海寧醫院，以醫生診治不得法，及蘇曼殊難禁口慾，始終無法好轉；一九一八年春，又移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貧病潦倒，衣物典當一空，全靠朋友接濟；但他仍對自己的生命充滿希望，

在病中曾致函蔡元培、陳獨秀，想在病好之後得一筆費用，赴義大利留學，專習繪事，可惜未能如願以償。到四月間，病情更壞，醫石罔效，他自己也已自覺，曾於紙上繪一雞心，旁註「不要雞心式」，致函廣州的胡漢民，託其交予蕭紉秋；蕭素知他未婚妻被逼退婚，矢志不嫁，抑鬱而終之事，見此乃嘆曰：「蘇和尚怕不久於人世了，他大概是叫我代購一塊碧玉，攜以見其地下夫人吧！」遂為購方型碧玉一小塊，託徐季龍（謙）帶給他，徐到時蘇曼殊已三日不進飲食，瞑目僵臥，聞玉到，微啓雙目，接過玉，叫護士扶著無力的手，將玉送至唇邊一吻，便涅槃了。時為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午後四時，遺體葬於杭州的孤山。（王澤遠撰）



革命僧人蘇曼殊。